

警惕涨价心态传染其他公共行业

叶祝颐 教育工作者

里昂证券亚洲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研究部主管鲍俊文5月14日表示，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与油价比起来具有较高的性价比，目前还有较大的上涨空间。在认为中国天然气价格有较大上涨空间的同时，鲍俊文认为中国目前的油价也偏低，而且不合理。鲍俊文说，中国的汽车拥有量比较低，如果不涨油价，意味着政府在给富人补贴。由于政府对油价的补贴，导致油价非常低，推动了中国对石油的需求。（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专家就是专家，见解果然“不同凡响”。鲍俊文先生不仅认为天然气价格有较大的上涨空间，还认为油价偏低，建议涨油价。气价油价都齐刷刷上涨，民生情何以堪？

按照鲍俊文的观点，目前在中国汽

车拥有量是每千人40辆，而在北美是每千人800的汽车拥有量，如果不涨油价，意味着政府在给富人补贴。多收富人的油费，既能保证石油企业多收钱，政府又可以减少对石油企业的财政补贴，还能促进公众合理消费石油资源。“一举多得”，多好啊。但是公众对此并不领情。不仅高收入者骂娘，还会“误伤穷人”。且不说有车族是否都可以归入富人的范畴值得商榷，众所周知的是，油价上涨会推高物流成本，加大了民众的通胀预期，甚至会引发涨价连锁反应，干扰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而百姓不懂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他们需要的是不涨价、不影响民生的穷人经济学。

与油价相比，天然气价低了，所以要涨气价；油价低了，让富人搭便车，所以要涨油价；按照专家的意思，气价、油价是否要不断轮番上涨下去？要说油价低

了富人搭便车，到处都有便车，穷人能上，富人为何不能上？以这样的逻辑推算下去，是否意味着供电、供水、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要大幅涨价，规避富人搭便车呢？

在商言商，企业是要赢利的。石油企业希望涨价的心情不难理解。从节能减排的角度看，上调油气价格似乎有几分道理。但是气价、油价是否非涨不可？在我看来，专家应该冷静分析原因，摆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引导石油天然气企业内部挖掘潜力，消化涨价矛盾，积极保障供给，而不是给剑拔弩张的通货膨胀局面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石油天然气属于商品，几大石油巨头属于经营性企业，并非政府机构，相当一部分石油天然气从国外购进，价格成本较高，为了减少油、气价差，谋求石油天然气涨价，无

可厚非。但是，石油、天然气是与广大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生活资料。

衣服可以暂时不买，猪肉可以少吃，牛奶可以少喝，但是石油天然气不能不用。不开车的人每天也在间接使用石油。何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还原公共产品公益本质，正在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专家此时却跳出来充当石油天然气企业的代言人，帮其嚷嚷涨价显得不合时宜，也失去了专家起码的责任操守与民生情怀。

再说，石油、天然气到底该不该涨价，如何涨价，专家说了不算，石油天然气成本核算与听证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听证主导者一方面要严格测算并公开供水成本，看看专家是否与石油天然气企业一个鼻孔出气，石油天然气企业到底是“真亏”还是“哭穷”，让消费者心中有一本明白账。听证程序及听证结果，

也应体现公平公正，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专家显然不能用纯市场眼光衡量事关国计民生的石油天然气供给问题，与石油天然气企业保持高度一致的涨价思维，为石油天然气涨价释放舆论烟雾弹，而应该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树立民生情怀，站在公共立场上说话。

对此，一方面，石油天然气企业要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把自己简单地界定为经营性企业，用纯市场眼光衡量石油天然气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要体现责任担当，不能“耳朵根子太软”，被专家惊之语所左右，把石油天然气服务放手交给市场博弈，任由石油巨头人为制造“油荒”、“气荒”，轻易满足他们的涨价要求，让石油天然气涨价影响民生利益。

别把洋奶粉“乱象”归咎于贴牌模式

江德斌 自由撰稿人

央视播出了记者关于贴牌洋奶粉的调查。调查中，记者只需交5100元就可贴新西兰奶粉商标，只需一万多多元，就可拥有一个原产地新西兰的品牌。专家表示，把婴儿食品当做日用品代工生产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据5月15日《京华时报》）

花费少量的钱，就可以注册到一个洋品牌商标，从而做起“贴牌洋奶粉”的生意。如此品牌运作方法，就是业内所称的OEM模式，乃是一种合法的经营手段，却被部分媒体批责为“乱象之源”，可见其缺乏基本的经济常识。

从报道可知，“贴牌洋奶粉”的操作模式，跟洋品牌在中国设厂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的路数一样，都是商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采取的经营模式。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品牌运作模式，产地、品牌、销售地既可以在一起，也可以分开操作，只要符合

属地相关法律即可。

如果洋奶粉不能搞贴牌，就等于否定此种经营模式，那么国内诸多依靠OEM加工生产的工厂，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显然，不能因为洋奶粉出现问题，就归咎于贴牌模式。须知，消费者更关注的，并非贴牌经营模式，也不是洋奶粉和国产奶粉的品牌差异，而是奶粉的质量是否可靠。

市场上之所以出现众多“贴牌洋奶粉”，皆因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空间巨大，有钱可赚。特别是在屡次发生奶粉质量事件后，消费者对国产品牌奶粉失去信心，为了安全起见，开始追逐洋品牌。在洋品牌奶粉价格一路走高，市场占有率却逐渐扩大的时候，就起到了示范效应，有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借用品牌和资本运作模式，生产出专供中国市场的“贴牌洋奶粉”。

因此，消费者不必对“贴牌洋奶粉”太敏感，只要其安全性可靠，质量有保障，就有权做自主选择。毕竟奶粉是婴幼儿的“粮食”，安全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国内消

费者之所以优先选择“贴牌洋奶粉”或者洋品牌奶粉，就是为了买个放心。至于多花出去的钱，则是为安全所付出的代价。要怪的话，只能怪国产品牌奶粉不争气，是它们自己一再犯错，才把市场拱手让给了洋奶粉。

奶粉市场乃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没有哪个品牌可以完全垄断，土洋之争是好事，足够的竞争才能实现优胜劣汰。至于“贴牌洋奶粉”浑水摸鱼的现象，则要根据相关法律予以规范，纠正其夸大宣传、标注不明等违规行为，就能够肃清市场。等到国产品牌奶粉把安全问题解决好，重新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后，照样可以努力把市场夺回来，甚至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上分一杯羹。

“贴牌洋奶粉”的盛行，也显示出国内资本走向成熟，掌握到品牌运作模式，了解市场需求。而且，这种模式不仅在奶粉行业存在，其他领域也有，只是规范性还不够。但假以时日，必将出现由华人持有的国际性品牌。

行业协会岂能借政府公信寻租？

汉应民 教师

央视《东方时空》日前报道了湖北省荆门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捆绑收取会费的问题。5月14日，荆门市迅速作出处置：暂停全市行业协会的一切收费行为；由市纪委监委成立工作组，对市驾协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由市审计局对市驾协近年来的会费收取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其他行业协会的清理整改工作也已全面展开。（5月15日《楚天都市报》）

针对央视曝光，荆门市闻风而动，立即调查驾驶员协会乱收费问题，并暂停全市行业协会的收费行为。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姿态值得肯定。但是由退休交警把持的驾驶员协会乱收费扯出了行业协会的监管乱象。从央视曝光的情况来看，当地驾协乱收费的问题由来已久，需

要长效治理整顿，一次两次整治风暴并不能解决问题。

驾驶员协会本是民间组织，由公民自愿参加，为何会出现协会强制驾驶员入会，捆绑收取会费的事情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行业协会并非纯民间社团性质的普通协会，它们都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

比如，驾驶员协会背后的大树是交警部门；药品零售企业行业协会背靠药监局，给个体劳动者协会撑腰的是工商局。驾驶员也好，个体户也好，医药企业也罢，他们顾忌的不是协会本身，而是协会背后的政府部门。

作为政府部门，以被管理者名义设立协会本身就成问题，利用行政职能向被管理者强收会费更是毫无道理。这些依托政府部门乱收费的协会机构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邪会”。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近年来，政府部门的二级、甚至三级部门因为收费混乱，管理无序等问题被公众质疑的例子不在少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牙防组事件。尽管原卫生部最后撤销了牙防组，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虽说这些协会、学会在学术研究、行业协调与补充政府职能不足方面曾经发挥过作用，但是由于监管缺位，有的学会、协会在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挂羊头卖狗肉，以各种名义捞钱。有的学会、协会已经成了政府公信形象的破坏者、不法商家的帮凶。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完善，有的学会、协会显得多余。

过于泛滥、缺乏监管的学会、协会，不仅耗费社会资源，给基层与企业带来负担，伤害了政府公信。还是形式主义、腐败挥霍的“温床”。对此，政府部门理应反思。

养老金并轨不应是“劫富济贫”

张枫逸 公务员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郑秉文表示，养老金改革之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其实是有好处的，他们的养老金就有了法律保护，不管地动山摇，这份养老金在他们退休时就是他们的一份资产。而传统的退休体制则不是这样，比如，下海了，出国了，或任何其他重大变故，养老金就没有了。（5月15日《燕赵都市报》）

最近，一则“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五年几无进展”的新闻，使得养老金并轨的话题再度升温。对于养老金并轨迟迟未能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者的干预和阻挠一直被视为症结所在。于是，呼吁“顶层设计”、“啃硬骨头”的声音，在社会上日渐高涨。

然而，郑秉文教授关于“养老金并轨对公务员也有好处”的观点，却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视角。原来，改革并非都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让各方参与者实现共赢。养老金并轨，意味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但从此他们的养老金就被纳入了法律保障，真正成为属于自己的财产。

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养老金有了法律保护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价值。不过，这种被改革对象也有好处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推广。

近年来，“公务员养老金是企业员工2到3倍”的事实备受诟病，成为公众呼吁养老金并轨的重要依据。但一个必须厘清的问题是，养老金替代率分化严重，究竟是公务员的退休金高了，还是企业的养老金低了？社会福利需要普惠式增长，“削高就低”并不科学，也不现实。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同样，当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还在憧憬收入倍增，退休金却有可能因为并轨面临削减缩水的风险，这如何让其产生内在动力去革自己的命？

养老金并轨不应是“劫富济贫”，而应通过“调低、控高、扩中”，让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从中受益。去年起，深圳市采取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相结合的办法，在不降低待遇的前提下，探索出一种既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又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只有建立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细化职业年金方案，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能实实在在共享养老金并轨的好处，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行政审批权下放不会导致产能过剩

吴小毛 职员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对此，有学者担忧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会导致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出现无序化竞争，导致过剩产能矛盾更加突出。

笔者认为，不必担忧行政审批下放助推产能过剩现象。这是因为：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开放型的，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和开放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企业会根据市场信息研判投资方向，不会盲目投资一些明显存在产能过剩的产业。

其次，行政审批改革也会建立更加公平和有序的经济竞争环境，打破垄断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国家必然放开铁路和电力、新能源等投资前景好、利润潜力大的行业，特别是民营资本。这样，市场资本就会向这些行业集中进行投资和竞争，进而社会资本就不

会那么积极地流向电解铝、钢铁等产能过剩产业。

再次，发生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盲目追求地方生产总值而上马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这次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不仅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取消和下放，地方政府层面也在改革相关的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投资经营的情况将大幅度降低。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基本形成，各地都按照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经济，比如东南沿海目前集中精力发展服务型和外向型的经济模式，轻易不再让高能耗高污染的产能过剩产业在此落地生根，这些产业正在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但是，只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产能过剩企业就没有生存空间。当然，这一过程比较痛苦，会造成一定的浪费。但是，没有这点儿痛苦，真正的市场机制就建立不起来，市场化改革也会停滞。

戏·画·闲·言

“扒皮公司”腐败瘤

吴之如·文并画

《北京日报》报道，近年来官员犯罪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官员的亲戚或身边人成立一个公司，官员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把工程项目分给这些关系公司，通过抬高价格，把公款揣入自己兜内。这样的方式称为“扒皮”。

因为扒的是国家资产之“皮”，因此“皮”极为肥厚、硕大无比，往往一“扒”就让当事者钱囊饱满，常“扒”则跻身富翁行列。他们凭什么如此之“牛”，能扒国财之皮而逍遥法外？无非是靠手中握有公权之柄，眼里没有党纪国法罢了。不用说，这一现象正是当前腐败浊潮中的一波恶浪，也是寄生

在社会肌体上的一大腐败恶瘤。这一伙腐败分子，恰是破坏中国现代化建设基业的蝼蚁，犹如亿万百姓百般厌恶的苍蝇老虎。假如有关方面不予以重视，甚至视而不见、宽容放纵，必然后患无穷，国家受害，百姓遭殃。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届党中央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习总书记在部署廉政建设的大计方针时，形象地提出，反腐败斗争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为除害安民、社会和谐指明了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有道是：

“扒皮公司”腐败肥，倚仗权力榨肥油；一家暴富万人怨，祸国殃民岂风流？

搞毁“扒皮公司”，拿下腐败官员，是时下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更是公众的意愿。这便是每遇腐败公仆落马，就引发民众拍手称快的根本原因。

